

媒体、思想与化功大法——大家谈《百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近来，《百家讲坛》成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热点。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就此问题进行了一次座谈，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讨论，让我们知道了当代文化现象与思想的复杂性。

关键词：媒体；思想；《百家讲坛》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

时间：2007年4月19日下午

地点：上海：胡晓明教授的书房。

参与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郭战涛、王大桥、刘汉波、戈双剑、杨晶、刘顺、朱兴和。

记录整理：朱兴和

观点（胡晓明）：《百家讲坛》所做的工作不是一个学术的工作，而是一个文化普及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不能用学术评价的标准来要求它。但是，我们可以用文化批评的眼光去解读它。阐释它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思想因素。我个人觉得，要了解这一现象，首先要懂得自新世纪发端以来，中国自上而下、上下合力提倡并促成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战略决策与重大转型，这是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都不同的重要时代特点。不明这个背景，说什么古典主义、说什么复兴国粹，都是不相干的。知道了这一点，才能知道《百家讲坛》中最重要的不是某个人的作用，某个人实际上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最重要的是媒体。但是当媒体参与了文化生产之后，会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后果。它做到了很多思想家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比方说，对传统文化的张扬（虽然这并不是它的初衷）。过去，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可能把《论语》搞得这样普及、这样深入人心，可以说，自孔子以来，都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媒体——而不是于丹——却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将来写当代文化史的时候，媒体所起到的呼风唤雨的作用、它对新社会的开发和建设的意义都值得我们去分析和解读。

朱兴和：媒介场力图在经济场与文化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说到底，媒介场也还是经济场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文化中最高妙的东西可能没法通过电视媒体的方式加以表达。比如说，像陈嘉映他们所研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上《百家讲坛》的。所以，我对知识人参与电视媒体的行为有点疑惑。

胡晓明：这里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最高深的最精密的东西大概是不能传播给大众的，曲高和寡嘛。还有另一种可能是，高手能采用“化功大法”，把市场化传媒和大众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加以化解，然后达到一种传播的效果。两种可能应该都存在的。

胡晓明老师：《百家讲坛》在座的各位看过吗？大概看过多少人的？

戈双剑：看过一点，不全。我看过孔庆东讲武功的，还有易中天的。

各位纷纷说：于丹，王力群，叶嘉莹，阎崇年，余秋雨，讲情商智商的曾国平，还有讲礼仪的金正昆。

胡晓明：那就是说，如果用百分比来说的话，平均下来，《百家讲坛》的东西我们大概只看过10%到20%左右。因为《百家讲坛》很多。如果它有十坛酒的话，我们大概只是尝过它的一坛酒，我

个人只是一坛中的一口而已。噢，话又说回来，好的品酒师，永远不可以把一瓶酒喝光才鉴定酒，那样他就先烂醉如泥了吧？同样，对于这坛酒，也许，我们只要尝一小口，也就可以的。

但是，我们还是得首先清楚，我们对《百家讲坛》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们的谈论不会是很拘束的、很专业的、很客观的，我们会很主观的。我们首先要定位准确：我们没有完整地熟悉和占有所有的材料。今天，借着《百家讲坛》这个题目，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相关的话题，比方说新媒体啊，传统文化啦，知识分子的角色啊，等等。我们不是完全针对《百家讲坛》来做一个透彻的学术考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还没有资格。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话题来谈论，这个话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牵涉到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与当代的文化思潮有重要的关联。所以，借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有这样一个小型的讨论，而不是一个严格的专业发言。在我们心目当中，基本上把易中天和于丹的东西定位为一个普及性的东西，而不是学术性的东西。就我们这个职业来说，一般是不太看普及性的东西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了解和关心，因为它毕竟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部分。一起来讨论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

首先，我想讲一点个人的初步的认识。《百家讲坛》所做的工作不是一个学术的工作，而是一个文化普及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不能用学术评价的标准来要求它。但是，我们可以用文化批评的眼光去解读它，阐释它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思想因素。我个人觉得，要了解这一现象，首先要懂得自新世纪发端以来，中国自上而下、上下合力提倡并促成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战略决策与重大转型，这是一个重要背景。这是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都不同的重要时代特点。不明这个背景，说什么古典主义、说什么复兴国粹，都是不相干的。知道了这一点，才能知道《百家讲坛》中最重要的不是某个人的作用，某个人实际上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最重要的是媒体。但是当媒体参与了文化生产之后，会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后果。它做到了很多思想家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比方说，对传统文化的张扬（虽然这并不是它的初衷）。过去，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可能把《论语》搞得这样普及、这样深入人心，可以说，自孔子以来，都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媒体——而不是于丹——却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将来写当代文化史的时候，媒体所起到的呼风唤雨的作用、它对新社会的开发和建设的意义都值得我们分析和解读。希望各位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正面、反面的都可以谈，而且，也不在乎别人说我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为，《百家讲坛》大概在两年之前也曾经找过我，让我来讲王国维，就是叶嘉莹先生讲的那个话题。后来，我说王国维我讲不来，因为太难把他讲得既让老百姓都能听懂又很深透。后来我就建议他们去找叶嘉莹先生。所以，我没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个心理。我们可以放开思路去讨论。我先这样开个头吧。

王大桥：《百家讲坛》立足于知识普及而不是学术传播，但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对它进行学术化，否则，仅仅只是抒发情感似的或赞或批，没多大意义。哪怕是批评也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比如，图像传播时代经典的传播途径与文字传播时代有什么差异，图传时代人们的生存经验与文字时代的生存经验之间有何区别，两种生存经验的区别对我们接受传统文化有何影响，等等。我认为，传统思想要对我们当代人产生心灵影响应该是有难度的，因为当代社会个人的自我被塑造与传统社会个人的自我被塑造实际上已经不一样了。当代自我至少被三种文化所塑造：主流意识形态、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如果以游泳作喻，传统思想是以潜泳的方式在塑造我们，西方文化是以自由泳的方式在塑造我们，而主流意识形态则是以花样游泳的方式的塑造了我们，三者在共同塑造当代自我的同时，也分裂了当代自我的文化心灵。其实，我说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从此出发进一步去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传媒时代传统文化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于丹讲《论语》，易中天品三国，还有网上的各种形式的如国学数据库的建立，等等，都告诉我们，在传媒时代，至少在当下，它是可能的。那么，如何可能呢？我觉得有种种方式。比如，数据库的方式，电视传媒的方式，传统文化意象再生产的方式，等等。我在想，胡老师讲的桃花诗和桃花意象如果用现代传媒的方式传播，比如，配上人面桃花的Flash动画和邓丽君的音乐，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它与小范围的交流、上大课应该是三种不同的传播方式。

朱兴和：《百家讲坛》就是用Flash的方式。于丹讲《庄子》、《论语》、易中天讲三国，都用的是卡通画面。三国用的就是现代卡通游戏的画面。

胡晓明：《百家讲坛》的人是聪明的。他知道知识生产时代的“新花样”，他知道什么方式能很快地进入年轻人的心灵世界，能够抓住年轻人。

王大桥：如果这种方式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要问，由动漫方式传播出来的感觉是不是与我们从文本阅读中得到的感觉有差别？因为传播方式不同我们获得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在传播方式的转换过程中，什么东西保留了，什么东西丢失了，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比如，易中天在讲董卓之乱时，说袁绍军队满城追杀杀太监，在洛阳城里见了没长胡子的人都杀，害得那些还来不及长胡子的小伙子见了袁绍的军队就脱裤子，验明正身。通过这种语言所获得的历史感觉是不是就走样了？

朱兴和：他实际上把历史戏谑化了。

王大桥：但是，我所关心的是，这种传达效果所带来的会心一笑，比如说于丹，她把《论语》做成心灵鸡汤一样，实际上她的许多感受并不能从《论语》中必然导出，而是借《论语》来说事，这样一来，《论语》中的哪些东西丢掉了？它还是不是《论语》？这些都是问题。在转换过程中，传统中的有些东西接下去了，有的东西却被剪断了。

胡晓明：这个问题提得有点意思。再引申一下，从新技术、新媒体以及新的观念（即现代与传统不一定对立、雅俗不一定对立等）来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新的知识生产时代，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知识的传播、知识发生作用的过程、完成任务的标准有没有变？是理解这个变呢，还是抵制、回避？这个变的结果，是什么？是人是鬼？或半人半妖？

郭战涛：我来说两句。首先，我对《百家讲坛》这种形式非常感兴趣。以前，老百姓并不怎么关心学术问题，后来，运用这种形式之后，很多人都在关注《百家讲坛》，由此可见，大众对历史和文化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以前大学老师的授课方式比较传统。当然，有些老师平时讲课就像《百家讲坛》一样，但是，大部分老师是比较学术化的，如果这样的课放在大众面前，他们是绝对不愿意接受的。以前，中央电视台也有类似的节目来讲传统文化，但是，看的人非常少。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根据我看的几集，《百家讲坛》对题目是有选择的，它一般选择在传统中有相当知名度的一些文本，一般老百姓也对它们多少有所耳闻，这样才有诱惑力。怎么讲？根据我的有限的了解，《百家讲坛》讲授的内容和方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于丹是一个代表；另外一个易中天；还有一个代表就是叶嘉莹。这三个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风格，所讲的内容和效果也完全不一样。像叶嘉莹讲王国维，是讲得比较学术化的，可以发现，她的现场中笑声非常少，她的方式是从文本中找出几句话来加以分析，学术性比较强，就像上大课一样，我想，很多老百姓是不太喜欢看的。到了易中天、于丹，情况就不一样了。先讲于丹好了。我觉得于丹代表了另外一种倾向。就像刚才大桥讲的那样，她先有一个现代人心灵鸡汤的定位，然后，再根据现代人所面临的心灵困感到《论语》中去找与此有关的语句。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她讲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看她的电视，有两处我是很有感触的。比如，于丹讲到《论语》中的几句话“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丹在解释这段话时强调说：“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真正保持心灵的那份恬淡和安宁。”她只是讲心灵如何获得安乐的问题，这是对现代人心灵安顿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她却忘了背后支撑颜回的心灵深处的“道”的作用，她把那个给舍弃掉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她讲到一个老和尚背小姑娘过河的故事，她说这个故事说明的是一个宽容的问题，现代人只有能够宽容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稳感，实际上这个故事是讲宽容的吗？可能未必是这样吧。我的整个感觉是，于丹是个学术小资。

她零零碎碎地读了一些书，然后矫情地面对现代生活来发言，她不是学术，她就是心灵鸡汤，你不能去要求她的学术含量。

朱兴和：我发现于丹的论述模式是这样的：一个经典或者现代生活中的小故事，然后加上一两句人生箴言，也就是电视屏幕上所说的“于丹心语”。而且，她还有一个口头禅，“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实际上，她的论述模式就是一个高中作文的模式，高中议论文的模式。

王大桥：我插你一句。我觉得于丹在这儿出了问题，但是她的成功之处恰恰也在这儿。她的定位是解答现代人的心灵困惑。她不断地用故事来贯穿讲座，就是为了传播的需要。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一开始不讲故事，讲学术，差一点要倒闭。后来，为了大众传播的需要，采用了两个方法，一是讲故事，第二是讲人物。所以，《论语》是有点难讲的，因为人物形象不是很清晰，故事性也不强。怎么办呢？外加故事，就像三国和李广的故事一样。把对象故事化，是为了传播的需要。它的讲述需要设置悬念，接近评书。

朱兴和：易中天就是典型的说书先生的风范。他的每一集的制作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设置一个悬念，引起听众的兴趣，到一集临近终止的时候，又设置一个新的悬念，并且还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整个就是说书先生的套路。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是很传统的，同时也是很现代的。

刘顺：那天跟大桥谈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提到了评书的问题。跟评书相比，《百家讲坛》里，特别是易中天与于丹现在谈的这些东西有什么差别？评书虽然很多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有一条线在里面，传统的价值观念，比如，忠义仁孝，总是贯穿于评书的始终。但是，网上有一些有关《百家讲坛》的评论，其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中国文化的无耻论！易中天也好，于丹也好，他们所谈的中国文化是没有耻感的。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颜回，孔子其实还有一句话，叫“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对道德感是有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同时对耻感也很有自觉。但是，你看易中天在讲曹操的时候，他好像得出了一个结论：只要你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就这跟传统的评书有很大的差别。他把经典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去掉了。

朱兴和：刚才大家讨论的是易中天和于丹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在讨论他们成功的技术性问题。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传统的评书和论辩家的技艺，但是，实际上他们与传统评书在价值和内容上差别很大。

王大桥：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这样一种有利于传播的转化过程之中，丢失的究竟是什么？

朱兴和：这是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刘顺：还有两个问题：第一，究竟丢掉了什么？第二，为什么会丢这些东西？于丹为什么会这么讲《论语》？我觉得，于丹讲的不是《论语》，而是“于丹心得”。她为什么老提所谓的心灵淡定法，而根本不提《论语》中的政治儒学？媒体背后还有什么？第一，媒体的商业化操作必定要强调收视率。第二，媒体背后还有其意识形态。媒体与社会制度是合拍的，它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然后，它还必须与受众的当下的生存感受合拍。这一系列因素的结合造成了于丹的成功。

王大桥：嗯，有道理。有一个叫黎鸣的学者说，信仰必须是抽象化，而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东西，信仰一旦具体化肯定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问题。在技术化、故事化、评书化和心灵

鸡汤化的传播过程之中，究竟哪些东西是不可避免地会被丢掉的，哪些是可以不被丢掉的，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分开来谈，可能会更加深入一些。于丹能不能做到，既能抓住我们的心、抓住大众的眼球，能让五亿而不是五百人听懂，又不丢失经典中最重要的东西？能不能做到？

刘顺：当于丹涉及到政治儒家部分的时候，她会用主体转换的手段，把它化解了。

朱兴和：我觉得于丹根本就没有看到你所说的《论语》之中的政治儒学。

刘顺：她看到了。本来《论语》中是讲对执政者的要求，她很巧妙地转化成对民众内心的自我要求。比如说在谈到“信”的问题时，孔子本来是在谈君主与执政者怎么做才能使其统治具有合法性让老百姓信任政府，但是，于丹这里却说，这说明老百姓对国家有认同这个国家才有凝聚力。她把这个话题巧妙地转化了。

朱兴和：究竟是她没有看到这个，还是她巧妙地转换了？

刘顺：是她看到了也不可能说。这就是背后的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

郭战涛：我也觉得于丹这里应该是个能力问题。

刘顺：知识分子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有个启蒙者的角色。这个角色不能把它抹杀掉。知识分子总得有个启蒙的任务。民众不是不需要，是你要让他觉得他需要。但是，在你说这个的时候，可能电视台就会把这段给你掐了。

胡晓明：但是她说的“国家认同”，难道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儒学问题么？媒体在建构一个文化的时候，具有重要的力量。麦克卢汉就说过，媒介即信息。经过筛选，经过重新建构，就会把信息变成他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不仅仅是于丹的问题——于丹也是受媒体建构的产物。每一种媒体都有一种力量，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但是问题复杂在于，中国儒家传统是有不同面相的，“国家认同”也是题中之义。当然完整地讲，论语以及儒家里的国家认同，有其他的认同譬如“道”来制衡。然而令人丧气的是，她（他）们又说她（他）们不是学术。

戈双剑：我倒觉得政治意识形态不一定太重要。《百家讲坛》虽然内容并不相同，你品三国，我谈《论语》，他解“红楼”，但其讲法却有大致相似的模式：时尚口语+流行概念+现实生活，这样吸引了不少听众，例如易中天、于丹的讲法。于丹的这种讲法实际上是很有技巧的，无论我们叫她避重就轻还是偷换概念，还是来源于生活还是什么，她确实吸引了很大一部分观众。在这个意义上，她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于丹个人的力量，甚至跟于丹这个人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王丹、郭丹、刘丹上去，谁都可以来讲，这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关于政治的话题不是央视不让她谈，而是受众不需要。

刘顺：我要插一句。你觉得现在的老百姓不需要反贪污反腐败吗？要的！政治层面民众还是很有要求的！

胡晓明：老百姓最喜欢看的是央视的《焦点访谈》和报纸上的类似报道。在政治上，其实他们是有很大的需求的。只不过媒体报道的程度受到了控制。比方说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陈良宇案发之后，去年整个上海卖得最好的书，不是我们这些人写的学术著作，也不是什么于丹，卖得最好的是陈良宇的案子。摆在地摊上，十块钱一本，需求量多大啊！我家对面的小地摊老板对我说，你需要多少就可以给你提供多少，500本都没问题。他们有专门的工厂。所以，去年很

多人靠卖这本书回家之后发了一笔小财。老百姓对这些问题是很关心的，只不过这些东西确实是受到控制的。我们的媒体的性质是有点单一的。有些东西是不让说的。

戈双剑：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吧。我接着再讲另外一个问题。于丹、易中天他们的成功，我们可以称之为“百家讲坛现象”。这种现象背后有一种逻辑。《百家讲坛》是一个传媒与学术的结合体，而传媒的背后就是商业逻辑，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个事情不会做得这么大。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受众群。今天《百家讲坛》究竟是些什么人在看？第一，中学生。第二，退休老头、老太。第三，在家里没事干的居家少妇。还有一些大学生以及一部分研究生也在看。《百家讲坛》讲的基本上不是学术，而是在进行文化扫盲。受众的水平被制片人定位于“初中水平”，而《百家讲坛》“根基又是学术”，这样一来，要保持一定的收视率就必须讲成“初中水平的学术”，不但要听得懂，还要好听，这势必带来学术的媚俗。《百家讲坛》实际上是将学术精英化转换成学术大众化、平民化。现在表面上看来是轰轰烈烈，出书的出书，签名的签名，全民的学术热情好像空前的高涨，然而，这样的情形又能持续多久呢？

胡晓明：他们说我不跟你们玩，我跟大众玩，跟市场玩。

戈双剑：所以，我们今天评论它，就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传媒的问题。知识分子进入传媒场就要通过一定的准入制度，换句话说，这就是需要认同传媒场中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主讲人个人素质，如风度、气质、亲和力以及形象等是否能够作为受众所接受，成为主要的标准。这样一来，一部分学者可能无法进入大众的视野，再加上面对观众的“新说书”方式也可能使一部分学者无缘成为“学术明星”。同样，传媒场也会过滤所讲的内容，这使得真正的学术选题无法进入场内。那些成为学术明星的人也不全部被学术圈子所承认。进入传媒场的知识分子，当然要遵守规则。作为其中的行动者，也并无多大自由，只不过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被统治者，他们的办事方式、思想观念、言行行为都以不犯规为原则。因而，《百家讲坛》上所宣讲的内容多是听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而被众多批评者指责的“误读”、“误解”现象也肇始于此。传媒场实际上是笼罩在经济场之下的，商业运作必定要迎合受众，受众需要什么，它就给他们什么，因此，它必然要舍弃许多东西，实际上就成为一种传媒大餐。

胡晓明：传媒确实是个很娱乐化的东西。刚才郭战涛提到，大学里面的教师讲课，只有少部分是用《百家讲坛》的方式，但是，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大学里面就应该是那种老老实实的甚至很枯燥的讲课方式，而不应该是《百家讲坛》的方式。因为说书是与严肃学院很不相干的。当然，不妨兼而有之，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问题简单一点来说的话，绝对是大多数大学老师应该按照知识的本来系统和本身的性质来把它讲清楚，求真，求实，而不是求好玩、求煽动性、求娱乐。但是，《百家讲坛》如果在大学里扩大了影响，很有可能有一天学生会对老师说：“你这个讲得太差了，讲得死气沉沉的，你下去吧！”

戈双剑：现在高校里面调查学生对老师的满意程度，如果老师按《百家讲坛》这样讲，讲得像郭德刚一样，肯定会是一路满意下来。

胡晓明：因为媒体会建构整个社会的口味，建构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包括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什么才是好的文化传播者，等等，久而久之，学校就会深受影响。我凭什么要像一个说书人那样煽情地上课？我应该像讲故事那样教书么？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口味来规定我的世界？当然，这只是站在大学的立场上说话。为什么要有大学立场说话的正当性？而不是各种立场的正当性？老师，你不能讲一点平等呀？我说呢？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平等嘛，一个往上坡说的人跟一个往下坡走的人，没有什么平等好讲。千万不要天真相信什么“平等”。有些左派知识人，总是有左派幼稚病，以平等的化身自我神话化。然而睁眼看看，市场力量太大了，中国当代文化很大的问题就是权力霸权与市场霸权，知识人的声音一直很弱很弱。有一个席间

一位出版社的老总说起，北京某年开一个高端的座谈，来了很多局长副部级之类的高官，介绍起在座的陈平原葛兆光等，他们竟然都没有听说过！

郭战涛：现在，有些中学校长就已经开始要求老师像易中天那样讲课。

戈双剑：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受众在传媒时代被称为“掌握遥控器的人”，然而，面对央视的《百家讲坛》在传媒制高点上的交叉火力，受众又有多少自决权可言呢？因而，《百家讲坛》基本上是强势传媒。要想通过受众的自我认知，从而对《百家讲坛》及其主讲内容进行辩识，这种可能性小之又小。随着传媒影响力的深入，如果大众被这样裹挟在其中，范围将越来越大，由中学生扩展到本科生，再过几年扩展到硕士生，然后再到博士生——现在，已经有一些硕士和博士朋友在看——这样，《百家讲坛》及其主张的学术将成为学术研究和传播中的主流与常态，我们的后辈也许将会通过网络来进行学术研究而不是一张平静的书桌，研究的将是与《百家讲坛》相应的初中水平的学术，如此一来，“学术”将走向何方？传媒的几个主要领导核心就可以左右主流社会风尚。那么，所谓的承担历史使命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们面对传媒的时候还有抵抗力吗？知识分子在传媒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和怎么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

刘顺：我想插一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受众理解为只是被动地接受。其实，受众在迎合的时候也是在疏离的。遥控器是在他的手里。我可以选择不看这个节目，或者，看完之后，我也可以骂。受众是分层的。媒体的力量未必有那么大。

王大桥：我们的讲话有点错位，不太能说到一起。胡老师刚才强调，市场的口味和需求是可以被媒体建构的。比如，我们对中产阶级的想象并不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是电视给予的。宝马，T恤，拿着高尔夫球拍挥杆打球，这是电视给我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于是，我们也会这样来要求自己的未来。如果媒体确实可以建构大众的文化生活，那么，知识分子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还有，你所说的电视媒体的商业运作在中国并不存在，你说的是西方社会的情况，至少，不是纯粹的商业运作。在中国，媒体是商业与政治的纠缠物。

胡晓明：商业和政治，双方都有的。收视率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指标。《百家讲坛》的收视率现在是央视里的第一号。意识形态也好，商业也好，都有，不必争论这个问题。我同意戈双剑的看法，现在的基本情况是，不是一个受众的选择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媒体的不断炒作和加温的问题。《百家讲坛》的造星运动正在不断加强之中。所谓的观众的选择权实际上是很虚的。前几天易中天来上海签名售书，报道说，读者排得像盘香一样的，这种报道其实又是一轮新的宣传和建构。大家又会趋之若鹜，新的观众又会被开发出来。

戈双剑：受众是有选择权的。但是，就目前的《百家讲坛》而言，受众是一个弱势群体。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在传媒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和怎么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首先，自己办电视台——在当今是不可能的。第二，鲁迅当年的办法，在租界写文章——但是在今天也根本不可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自己也还没有想到。

胡晓明：我们来凑一下。刚才他讲了两点。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刘顺：那天，跟王大桥谈到这个问题。于丹现象出现之后，知识界的许多反应很有意思。

胡晓明：我接着刚才双剑说下去。第一，我们不能办一个央视一样的媒体。第二，我们也不可能像鲁迅一样。第三呢？

郭战涛：第三是这样的。你们打断了我很长时间。我的第一轮讲话还没完呢。第三，就是我想

要回答胡老师的问题。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之内做一个讲述者，或者说教育者。我曾经听过一个中学老师讲和坤的。虽然，他也讲了很多花边小掌故，但是将大量的史料贯穿了进去，观众喜欢听。有人对易中天非常反感，说他讲课太不严肃了。可是问题在于，讲课的方式其实并不需要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他通过这种方式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即便是受到官方、商业和受众三种力量的控制，讲述者仍然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在这个有限的自由空间内，讲述者是如何做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中央电视台不会给你具体规定，应该讲什么话，它只会告诉你应该讲得活一点，难道会告诉你哪一句话该怎么说，用什么语气吗？不会这样的。它也不会指导这个学者要用什么材料和怎么来用这个材料。这些事情需要讲述者自己去做。即使是在政治上也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你讲反腐倡廉没人管。

刘顺：他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百家讲坛》内部着手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知识分子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不是从《百家讲坛》着手，而是要从《百家讲坛》之外做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从当前知识界对于丹现象的评论可以看出，一方面，出身于知识界的人更多的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评论，但是，更多的人，尤其是喜欢《百家讲坛》的人对这些评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妒忌了，他们看到别人赚钱眼红了——他们觉得这些知识分子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也就是说，在一般大众的眼中，学术已经很庸俗化和商业化了。民众已经对知识界丧失了信任。为什么？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许多学术腐败有关。如果要解决《百家讲坛》这样的问题，必须要重新建立知识分子在民众心目当中的公信。如果没有这种公信，不管你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会相信，别人总是要把你庸俗化，把你往下拉。你看，最近出的两本集子，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角度批判《百家讲坛》的两本集子，一本叫《孔子很着急》，一本叫《庄子很生气》，本来是很学术性的批判，却也露出一副商业化的面孔。可见知识分子本身也站不稳脚跟。

胡晓明：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学术化了以后会很可笑。没有人会理你的。整个老百姓会不理你，把你冷在一边。然后，你就根本达不到你的目的。比方说，你讲孔子所主张的深邃的道理，就会没有人理你。这样就会很尴尬很无力。反而显得很迂腐。而且，我还是要强调这个问题有其复杂性。传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比如说，于丹讲孔子，特别强调人的内心的自我抚慰，或者说是心灵鸡汤一样的东西——难道孔子学说中没有这些东西吗？

朱兴和：于丹的特点就是亦真亦幻，亦是亦非。你说她讲得太浅了，但是也还是有几分道理在。

胡晓明：对啊。什么背着小姑娘过河啊，背到对岸就放下，难道其中没有东方的智慧吗？你不能说没有。这个问题复杂。还有就像易中天所讲的三国背后的权谋，难道不真实吗？权谋和计谋的东西难道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智慧吗？而且，易中天把曹操讲得那样又可爱又可恨，非常复杂，实际上是运用了他的文艺理论知识。以前任何一个讲曹操的人，都是搞历史的。易中天是学文艺理论出身的。文艺理论的最大的收获，刘再复也说过，就是性格的多重组合。他就用了这个原理来看曹操，充分地发现了曹操多元的矛盾的充满张力的多重性格：又是奸雄，又是英雄，又是奸贼，又是豪杰，等等，他把曹操搞得非常的复杂。其实，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是有其正当性的。文艺理论要求一个称得上文学人物的人性格刻画得越丰富越好。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知识的正当性都很充足。比方说，从历史意识出发说曹操是个奸雄，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正当性的批判。但是，从现代文艺学的角度来说，又需要给他一个很多重的性格。这种视角的本身也是正当的。因为我是一个现代人，当然要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曹操。比方说易中天讲一个例子，在讲曹操的临终遗言的时候，他说，曹操临死之前不是细心安排政治后事，而是念念不忘家里的几箱香料、脂粉，关照要分给身边的女人，还说不要赶她们出去，让她们继续住在铜雀台，苏东坡就嘲笑他：这个曹操啊，平时掩盖得很好，到快死的时候终于露出了马脚，毕竟还是一个小人啊！苏东坡批判曹操是完全正当的呀，他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呢？他是从儒家圣贤的角度来看曹操。中国古人非常看重临终的遗嘱，遗嘱是看一个人这辈子所能达到的境界的重要标志之一。你曹操在临死前还在讲什么脂粉盒，那你生命的修炼是成问题了。

但是易中天怎么说？易中天说：在我看来，苏东坡是很成问题呀！苏东坡是我很佩服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老先生就不那么让人佩服，曹操就是一个有真性情的小人嘛！易中天从现代人的角度来批评苏东坡，也是正当的。他很明确地说，我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曹操。现代就是承认每个人作为男人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小人的权利——我可以就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去关心身边的女人。他也很正当的呀。问题的复杂就在这里。

朱兴和：易中天曾经讲到自己的历史哲学。他说他是从现代平民化的立场来看历史的。

胡晓明：对。他有他的正当性。所以说，批评界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就相当麻烦。如果你一味地骂，那么就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如果一味地表扬，那你就没有担负起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尤其是对于媒体的不苟合；你去批评呢，他在另外的角度上也有其正当性。所以说，是很复杂的。这确实是批评界的一个烫手的山芋。

朱兴和：而且易中天的水平说老实话比于丹还是要高一些。至少他对《三国志》和那个时段的史料还是很熟悉的。

胡晓明：三国他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朱兴和：但是很多人说于丹是“不学而术”。

胡晓明：不过话又讲回来了，不一定非要有“学”才能对孔子有贡献。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能传道，不一定需要很多的学问。于丹误打误撞的，像金庸小说当中的一个不懂事的小和尚，虚竹，动了一个棋子，却一下子下了一着妙棋。是不是这样也很难说的。

朱兴和：但是，偏偏她的头衔是教授。

胡晓明：但是，于丹有她的道理。她是传播学的教授，不是文学的。传播学出身的人会传播。这也是个学问，它可以很到位地直达人的心灵。你中文系的东西穿透力只有三分，她却可以有九分。这也是她的当行本色。

郭战涛：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学者该怎么做？我觉得要抓住媒体给我们的一切机会，把我们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想法表达出来。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发言？就在学术刊物和那些受众很少的地方发言吗？陈平原讲得非常好，我们身上都有两种角色，一个是作为学者的角色，另一个是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角色。作为学者来说，我可以完全不管什么《百家讲坛》而专心坐在书斋里做自己的学问。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就可以去做《百家讲坛》。既然可以去做，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是叶嘉莹的方式，还是于丹的方式，还是易中天的方式？

胡晓明：如果叫你去选，你会选哪种？

郭战涛：我觉得还是选易中天比较好。后现代（姑且这么说吧）的一个特征是把所有人的行为都商业化了。你讲学术好了，讲得好，他就可以拿去卖钱了。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人去关心你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胡晓明：《百家讲坛》的管理人除了不让你犯政治错误以外，其他的他都不管的——深度、浅度，他都不管的，他只管你的收视率。

郭战涛：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仍然有一定的自由度。刚才，我们是不是把媒体对学者的控制过于强化了，我想也不会是没有任何自由度吧？学者应该充分地利用媒体给予的机会。本来你的机会就非常少，好不容易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百家讲坛》，为什么你不去做呢？

胡晓明：郭战涛的观点跟我的观点很相像的。我在《中国文化意象的生产》这篇文章中就特别强调，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网络、新媒体、数据库、电子游戏等方式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加以传播。就像金庸小说里面所说的武功“化功大法”一样，用功去把别人的功吸过来，不管它是媒体的也好，商业的也好，还是政治的也好，把它吸到你向身上来，然后加以化解，然后尽可能地把我们好的东西、有深度的东西像发功一样发出去。不要去抵抗，也不要去回避，也不是要重新再造一个东西。

王大桥：在胡老师的眼中有没有用“化功大法”成功的案例？

胡晓明：有啊有啊！像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就是很成功的。它是大量的商业炒作铺天盖地而来的结果。《千手观音》也很成功的。它也是非常商业性的，同时，它的文化含量也很高的。李安的电影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学上成功的就不多了。《百家讲坛》中不少讲史之作，其实是相当成功的。

郭战涛：具体讲述方式是可以商榷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天性进行设计。比如说，易中天说，曹操在前方作战，而袁绍这帮人在后方开party，打电子游戏，这个大家听了觉得很搞笑，当然他是非常不学术的，但是他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浅显易懂啊。是不是说听众就能愚昧到都相信那个时候就可以打电子游戏呢？他这样讲，大家笑笑也未尝不可嘛，也调节一下气氛。这实际上是个教学技巧的问题。他这样打个擦边球也无所谓的。

胡晓明：各种人有各种风格。一个老师在讲中国古典的东西的时候，用一种幽默的语言或者时尚的调侃，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只要他是真正有内容的。讲课是应该有各种风格。我在中文系讲历代文选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给我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她说，我之所以喜欢听胡老师的课，就是因为胡老师的课当中没有一个词夹杂着时尚的语言。我之所以引用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讲课是可以有各种风格的。我当时那样讲课，确实不夹杂一点时尚语言，其实学生也是喜欢的，不要以为学生都是很喜欢时尚的。有的学生是很喜欢知识世界的那种纯净感的。当然，那是七八年前的事情，现在我讲课大概也会经常夹杂许多“粉丝”之类的时尚名词。所以，我觉得大学的讲坛应该是多元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化解一些东西，但是，确实要在背后有东西。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比如说，关于易中天，有一个家长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她说，现在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唐而皇之地来宣扬人类的某些权谋的心理，久而久之会不会对小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易中天的回答也很狡猾的。他说：总不能让每个小孩子都去读《白雪公主》吧？这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问题。不是说绝对地去让小孩子们读《白雪公主》或者三国中的权谋和勾心斗角，易中天是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了。这涉及到小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刚才好像还没谈过这个话题。我也想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郭战涛：对孩子的教育我现在是越来越困惑了。你让他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吧，别的人会因为这个孩子很没心眼；如果你把他培养成曹操——那自己也会过意不过，你怎么可以这样培养孩子呢？

胡晓明：对呀，这样就会丧失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观了。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这个社会人心不好，我怕讲好人讲多了，对小孩子不好。”这是实用主义加犬儒主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如果小孩子的心灵世界被这样建构就很可怕。而且，如果把白雪公主和曹操放在一起的话，他们并不是等量级的。学坏是很容易的，而学好却很难。就像林毓生先生说过

的，人性其实很贱的，他会往坏的方面去追求，坏的东西不学就会，而好的东西则需要引导。引导孩子向善也是大人的责任。所以我还是觉得小孩子多读一点白雪公主没什么不好。康德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家园，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说不要家园。所以，我们不要等到大家都无家可归了，然后再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家，所以干脆无家可归好了。

郭战涛：我想，关于教育孩子这样具体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呢？就是说，要让他认识到要去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同时，也要让他具备一种判断别人行为动机的能力。你可以不去做曹操，但是，你要知道曹操是怎么做的。如果你光讲白雪公主，不去讲曹操的话，那也是成问题的。

戈双剑：我觉得你这个是很理想化的状态。他一旦认识到曹操怎么做就会去学做曹操。

郭战涛：所以，操作的度要控制好。不过还是要看孩子的天性了。如果这孩子的天性一定要做曹操，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王大桥：北大的戴锦华就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她在讲王小波的时候，有学生问她：你愿不愿意让自己没成年的女儿读王小波的作品？戴锦华说：不愿意。她是把孩子成长的历程区分为许多生命阶段的。能看《三国》的孩子，大概是初三以上的孩子吧，可能已经走过了《白雪公主》的生命阶段。民间有个说法是，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也就是说，在接受传统经典的时候是要分生命的阶段的。知识分子在教育下一代上应承担许多责任。所以，我们要批评胡老师了。实际上您不应该放弃《百家讲坛》的机会。知识分子，知识人是应该有道义承担的。如果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于丹不行，那么，很简单，换一个人就好了。这样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讨论的关键在于探讨背后的原因。

胡晓明：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做点事情，这是积极的建构的态度。有一个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西方理论家，曾经提出了三个区分。一种叫撤退，撤退就是消极，就是不合作，就是干脆就不理你，自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另一种叫忠诚，忠诚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式的，充分发挥体制的作用，像于丹，还有许许多多，都是属于有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的观点，他与商业、市场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有合作；第三种叫声音，就是多少还是有一个道的关怀，还有一个文明和文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文明和文化的基本价值并不是说跟意识形态完全没有关系，并不是完全背离的，它们之间也是有重叠的，但是，如果知识人相信文明和文化的基本价值有其独立性时，就会自觉地发出一些声音，他会尽可能做好一些事情，尽可能地在允许的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结合自己的专业技能去发出文明和文化的基本价值的声音，这是深度的有思想的声音。现在上海的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和经纪人，或者是有些退休官员，戴上了房产公司的一些头衔，他们完全与房地产市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今天说这块地好，明天说那块地要涨，其实是在哄你，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忠诚”，忠诚于市场，忠诚于权力，这里面是有许多利益的。易中天背后的动机也是需要了解的。他要不要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呢？如果知识分子都变成有机知识分子，跟市场和权力结合在一起，那整个知识界就算彻底完蛋了，就会再也没有声音了。

刘汉波：今天胡老师为我们讨论《百家讲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其实，如果今天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平时也会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即便不讨论、不交流，我们每个人对《百家讲坛》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百家讲坛》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中间来了。我想，我们今天之所以批评《百家讲坛》，是出于两种担心或焦虑。一种是关于文化传承的担心，担心这种大众传播的形式会不会丧失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我们发现于丹讲述的《论语》与我们心目中的《论语》发生了很大的错位，我们以往看重的一些基本价值在于丹的讲述中不见了。第二种是关心孩子的人格建构的问题，担心我们的孩子在听了“于丹们”后，价值观或者人生

观发生扭曲。我们在座的要么正在做老师，要么做过老师，都承担了或承担过文化遗产的角色。那么该怎么样去进行文化遗产呢？是像《百家讲坛》这样传承呢，还是像以往那样去传承，实际上我们心里一直在考虑。大众甚至在校学生向传媒一边倒的倾向会不会对文化遗产造成负面影响呢？事实上，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虽然观众对媒体是有选择权的，但实际上大多数人是放弃或者无意去选择的。《百家讲坛》我很早就看过，当然当时它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影响力。现在，我们的授课方式或文化遗产方式会不会受到它的冲击？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种冲击？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百家讲坛》中去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同时也注意避免犯《百家讲坛》同样的错误，将一些不该丢的基本价值保存下来？

刘顺：我们现在对于丹和易中天提出一些批评——用批评也许还不太恰当吧——我们批评的焦点是什么？是他们讲述的方式吗？不是。焦点在哪儿？焦点在他们所传播的那种价值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在反思《百家讲坛》的时候应该抓住这个焦点，而不是说要去讨论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来授课。不是传播方式的问题。他们所传播的价值与经典的价值发生了背离。

胡晓明：不过，刘顺这个大判断我觉得还是可以商榷的。是不是他们所传播的价值真的走样了，学术界也好，老百姓也好，好像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那些批评她（他）的人，尽是做文化研究的。做三国的、两汉的、以及儒学的，有没有整个起来抵制批评她（他）们？可能还不能这样下一个大判断。大概只有那个“十博士书”是说他们的价值出了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复杂地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就说他们出了问题。复杂在这里，他们既有问题，又有成绩。其实不是说它是个病人——如果你说《百家讲坛》是个病人的话，没有人会承认的，学术界和老百姓都不会承认的，喜欢它的人都说它是一坛好酒，也许它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于丹也好，易中天也好，特别是于丹，她确实在文化和知识功力上还不够，但是她确实做了好事呀。很大的好事啊！孔子和《论语》能够这样地深入人心是很了不得的。我其实没有看过于丹的书，但是，我只是看过她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一篇。我感觉她也错不到哪里去。《论语》是很多元的东西，它有政治儒学，也有心灵儒学，有伦理的东西，也有关于国家和政治的东西，《论语》本身是很复杂的。《论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碗大白米饭。有人说是搞成快餐了，大白米饭做成快餐也没有什么。白米饭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老百姓需要一些励志和心灵安慰的东西，实际上很多老百姓是不太关心什么学术和大道的问题的。“贤哉回也”她这样讲也未尝不可，把“道”用括弧括起来，然后讲它的快乐，也未尝不可啊，因为它确实也是快乐的。如果她能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就是说，让人觉得挣钱和现代生活是快乐的，也是很不错的。这样的说法，大体跟梁漱溟所说的“打开《论语》一看，满篇都是乐字。不像打开佛经来看，满篇都是苦字”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差错。就是说，不会错到哪里去。你不能给她一个大判断，说她在价值上出了大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学术界、思想界自五四以来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把传统的东西加以践踏。用饶宗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百年来传统中国受到了极大的践踏。现在，通过《百家讲坛》和于丹这种误打误撞的方式，传统能这样大面积地深入人心，不管它的精神层次有多高，它能让传统文化以这样高的姿态重新回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站在传统文化复苏的立场去看，这确实是个大事情。文化的复苏有许多渠道，传统文化背后也有“化功大法”，它也可以把于丹给化解掉。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不是它在利用央视，利用于丹，在实现它的“转世金身”或“金刚不坏之身”呢？这个也很难说的呀。这是我想到的一个观点。我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比方说佛教。佛教有一个观音教，她甚至要化成金沙滩上马郎妇，什么意思呢？她要变成妓女，为了传道的方便。她也是传道呀。所以，我们不要把《论语》看成是一个非常高级、高贵、很学院派的训诂考证的对象，《论语》这种经典大就大在这里，它真的是“有容乃大”，它能够容像于丹这种误打误撞的人。即使她把它讲成那个样子，照样也不损它的生命力。

郭战涛：能不能这样说，在有限的时间段内，讲述方式肯定是要决定讲述内容的？如果我们只要求于丹讲述《论语》中的一部分内容，那她是没有问题的。

刘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她所提供的论据并不足以支撑她的论点。她的结论并不一定能从她所提供的材料中推导出来。

胡晓明：我完全同意。于丹实际上先有一个预先的设定，比如心理健康、心灵淡定之类的东西，然后再在《论语》当中找个故事套上去。说老实话，这既是《论语》的方便乖巧，也是于丹的聪明和运气。

王大桥：实际上我一直觉得她谈的是“关于《论语》”而不是《论语》心得。刘顺是用真正的《论语》来要求于丹的。

胡晓明：所谓的“真正的《论语》”学术界也是不承认的。没有“真正的《论语》”，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论语》，明清的时代有明清的《论语》，两汉、魏晋、唐宋，包括现在，也都有自己的《论语》。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不同时代的《论语》都有其正当性。

郭战涛：它有没有一定的底限？它的下限在哪里？

胡晓明：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所谓底限是什么呢？底限就是不能把《论语》讲坏了，把世道人心讲坏了。人心是要向善的，这是最大最大的底限，如果把人心讲坏了那就完蛋了。

王大桥：刘顺的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于丹是讲给高中生听的。

胡晓明：《百家讲坛》的制作人有个想法，就是要把所有的听众都当成初中生。这是它的定位。实际上能把《论语》讲得更好的大有人在，但是，只有她能让大家当成初中生，所以，她就成功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朱兴和：她是高中或初中语文老师的讲法。从《论语》中找一段材料，然后加以分析，她的口头禅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中学考试材料分析题的做法。而且每个故事之间的关系都是平行的，没有层递和深进，没有易中天那样有悬念有递进有勾连，她就是把一个又一个故事平行串连起来。

郭战涛：我仍然觉得易中天的讲授更能给我以启发。于丹最大的失误可能是，她要在《论语》中所找的材料可能恰恰是脱离语境的东西，断章取义地进行解释，可能完全讲反了。这不是我提倡参与《百家讲坛》时所希望看到的。能不能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尽量不走样的情况下，也能讲出《百家讲坛》那样的风格来。

胡晓明：这就不是《百家讲坛》取人的标准。它就要求初中生都能懂。

朱兴和：《百家讲坛》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商标，或者说是一个公司。按照卡尔·博格斯的分析，现代知识分子处在商品化、世俗化和工具化的大潮之中，教授越来越成为经理或者企业家。《百家讲坛》请的都是教授，他们有这个倾向。实际上，于丹和易中天他们都是媒体商品制造流程中的一道工序而已。他们的被选中和他们的表演，都是商品生产中的必然环节。

胡晓明：它要生产大量的食品，来喂饱那些嗷嗷待哺的“初中生”。说真的，全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过去百年中国严重缺失，严重营养不良，所以大家只能是这个水平。到了我

们的子孙那一代，我相信他们就不会要了。

朱兴和：实际上，从电视讲座的专辑到光碟到与此捆绑销售的印刷品，都是商品。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商品生产的流程来完成的。所以，它只能遵循商品经济的规则，而不是根据文化的规则。如果再引用一个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说，经济场与文化场遵循的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规则。媒介场力图在经济场与文化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说到底，媒介场也还是经济场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文化中最高妙的东西可能没法通过电视媒体的方式加以表达。比如说，像陈嘉映他们所研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上《百家讲坛》的。所以，我对知识人参与电视媒体的行为有点疑惑。

王大桥：陈嘉映在“世纪大讲堂”上讲的效果就非常好。

胡晓明：陈嘉映是很懂得怎么传播的，他能把一些很深邃的哲学问题化为日常话语。这里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最高深的最精密的东西大概是不能传播给大众的，曲高和寡嘛。还有另一种可能是，有些高手能采用“化功大法”把传媒和大众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加以化解，然后达到一种传播的效果。两种可能应该都存在的。

朱兴和：像南怀瑾那样还不错。

郭战涛：他基本上不走样。

王大桥：于丹拿《论语》说事与大话或戏说之类在对待经典的方式上好像并无太大不同，都不是真正面对经典的态度，只是拿经典说事。实际上，有些问题是生活的问题，有的是心灵的问题，有的是心灵背后的价值问题。生活中的问题必须遵循生活的逻辑，在生活中才能解决，我生病了，不给我治永远好不了，你再给我讲《论语》、《庄子》都没用的，住进医院开一刀才能好。把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还原成心理问题，遮蔽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如果说她能在心灵上包治百病，真的有点在抬高她。

朱兴和：她是小资的心理按摩师。小资下班回家，累了，打开电视，她给你按摩按摩。

戈双剑：我发现一个问题，现在人们不管《百家讲坛》谁在讲，都会去看一眼。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品牌。看《百家讲坛》都已成为一种时尚，而且这种时尚正在形成一股强势潮流。这是传媒与学术结合而“成功”的一个神话，这种成功对《百家讲坛》及其中人来讲，各方面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当《百家讲坛》成为一种时尚，它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时尚的走向是什么？它能走多远？它的后果是什么？

刘顺：没有这种时尚就会有另外一种时尚出现。用海德格尔的理论去解释的话说，就是，人在沉沦之中，就是在时尚当中。

胡晓明：为什么不讲海德格尔？《百家讲坛》下一个热点说不定就是海德格尔呢。国学热过之后，《百家讲坛》会换花样的，它要出新出奇，因为媒体要在观众出现审美疲劳的时候增加新的刺激。说不定有一天会选择海德格尔。

戈双剑：在国学热之后，下一个是哲学热呢，还是文学热？

胡晓明：所以，央视这个媒体很重要。它在左右着中国未来的思想潮流。不过，我在网上看见有一个观点，是从史学与文哲的消长来看。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三十年一世来看，文学是

开头热。为什么文学开头热呢？文学承担的是给人梦想、给人以生命的希望、给人以做梦的空间的任务，所以，三十年前，文学是很热的，就是我当年读书的时代。那个时代，文学在大多数青年人和知识人的心目当中都代表着理想，代表着梦，代表着生命和人生的意义。后面是哲学热，哲学承担了思想探索和改造社会的任务。为什么现在轮到史学热呢？我想不是因为梦也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而是因为对于社会来说，梦和理想，都不能长久。而且，那像刚才所说的那样，《百家讲坛》的受众有许多是退休人员，这些退休人员大多数生活已经安顿了，前景一眼就可以看得到，中国也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了，所以，就不需要再提供一种启蒙的新方案，或者一种关于新世界来临的想象，也不需要真正的激情，因为退休了，满意了，这个时候史学就来了，史学是向后看的，而且又是享受的、了解的、理智的。退休的人是既以一种消费的眼光、同时又是反省的眼光看《百家讲坛》的，就象在茶馆中喝茶一般，喝一口，要回味一阵子。年轻人为什么也喜欢易中天呢？那是因为他们太缺少文化了。他们可以从这里了解文化和传统。现在的年轻人也还没有达到有梦的境界，也不需要生命的新意义，他还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所以，史学就填补了中国精神生活中很大的一块空白。其实，某种意义上，不要把于丹完全看成是心灵鸡汤。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她来了解圣贤到底说了些什么，还是可以通过她来了解第一流的经典，这对年青人和中学生来说还是有意义的。这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史学的需求。所以，从大的尺度来看，就要对于百家讲坛这样的事物，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它毕竟为文化做了很多好事，学院里的知识人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我们跳出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根据不同的知识生产的样式，根据传播的方式特征，来梳理出一个20世纪中国精神生活需求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风水轮流转。文学和哲学的角色都凋零了，都尘埃落定了。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看历史。史学就是尘埃落定。这种史学不承担求真求实的任务，它的目的就是消费。易中天就是把历史和人物做成一道大餐，或者说是做成一碗五香俱全的麻辣烫——这个曹操就是一个在性格上有很多花样的很好吃的东西——他让你去充分地消费。接下来，《百家讲坛》还会有什么花样来回应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大家可以预测一下。

王大桥：接下来是《水浒》。因为它是史学与文学和结合。

刘汉波：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选题是有讲究的。易中天也讲过汉代风云人物，可是，没有“品三国”那么火爆。老百姓有一点了解但是又不是很清楚的选题容易走红。比如说《论语》，谁没有听说过《论语》？但是，很多人没有好好读过。

朱兴和：所以，下一个目标就不可能是海德格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水浒》或者《聊斋志异》之类的东西。

郭战涛：但是观众可能很快就看烦了。我认为可能会讲中国文化现象。比如说明末清初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明僮”，像这种现象是极其有趣的。如果讲出来，影响绝对不会低于易中天讲三国。

朱兴和：有可能会讲民国演义，比如说穿插历史和文学作品讲章太炎、汪精卫他们的故事，等等。

胡晓明：这也有可能。因为这方面还有大量的东西没被开发出来。

戈双剑：还有可能讲军事题材。比如说共和国战争史、十大元帅之类。

胡晓明：这个已经很多了。但是也有一些空间。比如说军事史中被忽略的一些内容。《百家讲坛》还是有可能越来越精彩的。

朱兴和：诗歌有没有可能？

胡晓明：诗歌也是有一定受众的。它与人心深处的某种类似乡愁一样的东西有很深的关联。央视敢会开发这方面的节目么？但是，不太可能再是叶嘉莹以前的讲法。叶先生的书是第一流的，讲诗，她是第一人。但她的讲法比较传统。诗歌要是讲得好，可以直达人的心灵。比如说，叶先生也一直提倡通过歌唱或吟颂的方法，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接受诗歌。这方面，一定会有高人出现。一旦出现，就是革命性的。我愿意期待。

今天的讨论很好。我们不一定要达成什么共识，但我们至少知道了当代文化现象与思想的复杂性，这也就够了。最后我再补充讲两个意思：

一是我们看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史，直到现在，其中中国文化的声音究竟有多少？我想每个文化人心里都是清楚的。中国本身的学问，与艺术，都要用西方式的语言来表述，才算是学问，才有人可以听得懂，这个事实，于今仍未有根本的改变；中国文化的传播，依然没有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呀，那么，我们再想想《百家讲坛》做的工作，不能不客观讲一句，对于改变文化创造、文化传播的不平衡格局，是十分有意义的了！我们能不能在长时段的观察之后，对它多一点宽容？当然，如何在扩大中国文化传播的地盘的同时，也向上、向高度发展，也是应该提出来的新课题。

二是我们再看近现代的那些讲中国文化的知识人，我们看那些风云人物，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等，再看看这个时代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真有一点说不出的悲喜剧意味。康、章、严、梁等，都有一个新社会的大图纸，新知识人的大规划，新历史的大开拓，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正当性。而且，无论如何，中国的儒学，在他们手上，是呈出了一份精彩。然而想想今天，那些精彩、那样的人格，到哪里去了呢？多少教人有些悲哀。但是再一转念，儒家的转世，从康有为到于丹，不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么？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再有康有为式的蓝图了，这是一个很肯定的事情。儒家一定要走出康有为情结才行。但是，并不是除了康，就是于。知识人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还多得很啦。我们都好自努力吧。谢谢大家！

Media, thoughts and method: discussing “Forum for all School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ly, “Forum for all Schools” has become a social hot. Teacher and students of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held a symposium about i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we hope we will know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oughts.

Key words: media; thoughts; “Forum for all Schools”

收稿日期：2008-3-1